

**一、香港的法治傳統、挑戰及恢復**

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下，香港得以享有高度自治權；同時，香港不僅保留普通法法律制度，成為中國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而且在回歸後，香港的法治建設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成為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石。例如，香港的法律制度在國際上享有良好聲譽，回歸以來法治指數排名一直保持世界前列；香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香港擁有世界上最廉潔的政府和公務員隊伍；香港擁有完善的法律基礎設施，吸引了海外和內地公司在香港開設及發展業務；香港法院已建立一個完善的商業案例法檔案庫；知識產權在香港受嚴密保護。

不過，2019至2020年間發生的修例風波，香港社會秩序、法治秩序受到很大衝擊。中央其後為香港制定國安法，推動完善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到位。而今，香港社會和市民進入到了一個相對平靜的環境，是時候來思考香港未來的法治建設和發展。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忽視修例風波及香港國安法落地對香港的法治和營商環境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此外，由於疫情防控、入境檢疫等限制措施，香港面臨人才流失、企業轉移等問題。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中承認過去兩年本地勞動人口流失約14萬。在此大環境下，思考香港的法治與社會發展和大灣區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是必要，也是適時的。

**二、法治建設和大灣區建設並舉**

## 真正已成過去的是英國自己的「黃金時代」

**國際關係** 英國首相蘇納克也不得不對華喊出硬話。11月28日，蘇納克發表了上任以來的第一次外交演講。對華政策方面，他強調中國對英國的價值觀和利益「構成了系統性的挑戰」。如此表述，顯然不是知華務實之論。儘管如此，英國政媒兩界還是不滿，認為蘇納克對華不夠強硬，對華是「綏靖主義」和「錯誤」，主要原因是蘇納克沒有把中國視為「威脅」。

### 緊跟美國的「政治侏儒」

反華慣性成為英國的政治正確，中英關係的「黃金時代」也開始黯然失色。諷刺的是，「黃金時代」的說法，並非源自中國，而是英國前財政大臣歐思邦於2015年時所說。卡梅倫時代中英關係雖有波折，但在高鐵、核電合作上頗有合作共識。英國也對中國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頗感興趣。當時的英國政府雖不至於對美國說不，但在中英關係上還有一定的自主性。卡梅倫下台後的文翠珊，雖然脫歐談判是其主要使命，但也讓中英「黃金時代」延續下去。文翠珊於2018年初對中國開展正式訪問，宣布中英構建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文翠珊因為脫歐談判而黯然下台，約翰遜政府開啟反華模式。一方面，約翰遜屬於保守派，反華是其基本的政治立場；另一方面，約翰遜完成了脫歐談判，英國成為歐洲「孤兒」，在政治經濟上都唯美國馬首是瞻。特朗普時期開啟對華貿易戰、關稅戰模式，約翰遜被視為「英國特朗普」，約翰遜自然也隨美反華。而且在香港黑暴期間，約翰遜政府支持香港暴亂，中英關係更急劇惡化。伴隨著拜登時代的來臨，「美國回來」不僅修復了美西關係的裂痕，也使約翰遜政府更加靠近美國。拜登政府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在地緣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加大反華力度，約翰遜也成為美國反華急先鋒。約翰遜因醜聞而下台，短命首相特拉斯不僅延續前任的反華風格，而且將中英關係拖至冰點。

可見，中英「黃金時代」失色於約翰遜時代，終結於特拉斯時代。但這只是內因，外因卻是美國政治形勢的變化或者說美國對華關係的轉變。內外因共同強化了英國的反華慣性，緊跟美國只會令自己變成「政治侏儒」。

蘇納克很年輕，且有財政大臣的任職經歷，人們認為他對中英關係的定位和評價相對務實穩健。但是其擔任英國首相後，在英國反華慣性的影響下也成為反華

2022年10月19日，李家超發表的施政報告，其中重點提出「鞏固法治核心價值」，具體的舉措包括進一步推展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宣傳教育；進一步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維護獨立的司法權，全力支持司法機構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保障和支持法官、檢控人員和法律從業人員依法履行職務，維護司法公正和法制精神。

與此同時，施政報告還特別指出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契機，促進大灣區城市間的互聯互通和融合發展。新一屆政府將成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由行政長官擔任組長，從策略和宏觀角度推進及督導跨局工作，加強與內地機構溝通，並定期舉行國家政策解讀活動。

由此可見，本屆政府非常重視，並且有意願、有計劃落實大灣區建設。大灣區建設千頭萬緒，法治建設乃是基礎性和保障性的建設工程。

**三、建設「法治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乃是「法治灣區」建設的應有之義，也是重要目標。雖然中央主導並已經出台了系列政策，包括2017年7月1日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推薦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和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綱要》），但是這些政策方針屬頂層設計，高屋建瓴，各項內容尚待具體措施來落實。**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國家整體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建設大灣區的具有全域性的戰略意義。從概念提出至今，灣區建設意見取得很多階段性的成果，但是灣區「9+2」進一步融合發展，共同打造「法治灣區」和「灣區法治化營商環境」仍然有許多待解決的實際問題。粵港澳大

灣區「一個灣區、兩種性質法律制度、三個司法管轄區」之特徵，為世界獨有，故無先例可資參照。為建設一個「法治灣區」，我們需要量身定做，特別是制度創新。

第一，目前來看，從國家到地方，大部分關於大灣區建設的文件仍然採用「軟法」的形式，表現形式為綱要、報告、備忘錄等。和「硬法」相比，這些「軟法」欠缺約束力、可執行性和明確性，未來應該更多地採用「硬法」的方式，即由立法機關制定區域性和地方性的法律，即使中央制定框架性文件，最好採取法律這一方式。

「大灣區律師」法律服務業合作方面已經採用了這一方式，並且取得了實質性進展。2020年8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授權國務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 and 澳門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的決定》，同年10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2022年7月，廣東省司法廳為四位港澳律師頒發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證，他們成為全國首批獲准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執業的港澳律師。推而廣之，在其他方面，也可以以立法加行政立法方式推進。

第二，受制於三地各自獨立的法律系統，並且各有立法機關，「聯合立法」難度大，這一局面（實為「難處」）實質上是由「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等政治原旨所決定的。為解決這一難題，可考慮採取

政客。儘管他的反華立場較之約翰遜和特拉斯相對「軟」。譬如約翰遜和特拉斯將中國稱為「系統性競爭者」和「威脅」，蘇納克則把中國當成「系統性挑戰」，但還是被英國反華政策齊聲批評。這也凸顯，英國反華慣性短期內難以逆轉，無論誰上台都無法改變反華局面。有着印度裔背景和貼着富豪標籤的蘇納克，也只能採取政治正確的機會主義立場，在對華關係上選擇自以為是的「中間值」——但是這種投機取巧的政治立場，反而讓其陷入更尷尬的境地——得不到反華政客的認可，更無益於中英關係的改善。

蘇納克宣稱「中英『黃金時代』過去了，認為貿易將會帶來社會變革的幼稚想法不復存在」。照此邏輯，蘇納克連中英關係的紐帶也要不管不顧了。那麼中英關係的未來將會十分危險，不僅「政冷」加劇，「經熱」也難以為繼。這對英國又有什麼好處呢？畢竟，蘇納克也算是熟悉經貿的政客，深知英國經濟面臨的嚴峻挑戰。高通脹成為英國的全年性困擾，2023年英國經濟將出現收縮，GDP將下降0.6%（相比之下，2022年的預期為4.3%）。在此情勢下，蘇納克宣布了規模達550億英鎊的增稅減支計劃。這項計劃能否改變英國經濟的頹勢難以預料。

### 德法強化對華經貿關係

作為島國，英國經濟引擎疲弱——投資乏力、消費不振，外貿動力因烏克蘭危機和疫情影響而減弱。脫歐後的英國正在尋求新的貿易增長點，譬如和美國、東盟、印度建立新的貿易關聯，甚至英國要加入亞太的CPTPP。中英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2021年雙邊貿易額超過1100億元，中國是英國的第三大對外貿易國和第一大進口國。中英雙向直接投資存量達478億美元，比疫情前增長近50億美元。

中英經貿關係既是雙邊互利雙贏的紐帶，也是支撐英國經濟的貿易動力之一。若蘇納克為英國反華慣性所綁架，中英關係變成「政冷」也「經冷」，中英「黃金時代」不僅黯然失色，也會讓意識形態掛帥的英國政府失去中國這個重要的貿易夥伴。

相比英國，歐盟的兩個重要國家德國和法國，則繼續強化對華經貿關係，兩國領導人都表示不會和中國經貿「脫鉤」。這也凸顯，兩個重要的歐盟國家雖然政治上追隨美國，但也體現出靈活的主體性。英國緊隨美國反華，失去自主靈魂，這樣的英國政府，失去的不僅僅是中英合作雙贏的「黃金時代」，還有自己的大國地位。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 建設法治灣區的香港貢獻



灣區「一個灣區、兩種性質法律制度、三個司法管轄區」之特徵，為世界獨有，故無先例可資參照。為建設一個「法治灣區」，我們需要量身定做，特別是制度創新。

第一，目前來看，從國家到地方，大部分關於大灣區建設的文件仍然採用「軟法」的形式，表現形式為綱要、報告、備忘錄等。和「硬法」相比，這些「軟法」欠缺約束力、可執行性和明確性，未來應該更多地採用「硬法」的方式，即由立法機關制定區域性和地方性的法律，即使中央制定框架性文件，最好採取法律這一方式。

「大灣區律師」法律服務業合作方面已經採用了這一方式，並且取得了實質性進展。2020年8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授權國務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的決定》，同年10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2022年7月，廣東省司法廳為四位港澳律師頒發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證，他們成為全國首批獲准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執業的港澳律師。推而廣之，在其他方面，也可以以立法加行政立法方式推進。

第二，受制於三地各自獨立的法律系統，並且各有立法機關，「聯合立法」難度大，這一局面（實為「難處」）實質上是由「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等政治原旨所決定的。為解決這一難題，可考慮採取

一些人員稱行政長官建議今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是所謂的「肆意釋法」，甚至抹黑有關決定會「破壞」香港普通法制度，云云。事實上，即使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外籍律師，當事人的權利保障並沒有任何影響。而且當局可以此契機，調整目前司法界現狀，保障本地法律界人士就業，香港律師優先。特區政府在處理本案時，一直胸懷國安大局，堅守法治精神和專業要求，全力維護國安法的權威和尊嚴。

從是次終院判決可見，確保香港國安法得到完整準確、不折不扣的貫徹實施任重道遠，暴露的問題須一一解決，要做的工作還很多。香港司法機構有必要進行司法改革，進一步加強對香港國安法的正確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因應情況，對其條文適時作出權威解釋，正是完善特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的應有之義。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執委



就海外大狀可否參與處理涉危害國家安全案件，律政司早前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許可申請，但被終審法院拒絕。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向中央政府提交的報告中，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筆者認為，相關案件性質特殊、影響深遠，特區政府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是合憲合法合理的必要之舉，有利全面準確落實香港國安法，確保國家安全得到有效維護。

香港國安法是全國人大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國安法第六十五條列明：「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故行政長官提請由人大常委會釋法，完全符合香港利益和憲制權力。

國安法第六十二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體現出香港國安法具有不可置疑的權威性和凌駕性。正如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指出，一些人簡單套用審理一般案件的原則、程序和習慣，未能正確認識香港國安法的憲制地位。

此次釋法有利於釐清香港國安法立法原意和法律原則，明確了憲制層面規定的清晰規範，恰恰更有利於香港法治進步，有利於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眾所周知，黎智英長期反中亂港，怙惡不悛，是外國勢力在港的主要「代理人」，多次獲得外國反華政客接見，這宗案件的審訊很大程度受到外國勢力直接或間接干預，甚至有可能令審訊偏離法律的正道。尤其是他涉及的「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更是性質嚴重，因此此案的審理過程和結果，都備受關注，亦影響深遠。



2019年1月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提出五點主張，其中第三點中指出：「我們堅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

2022年11月26日，台灣舉行「九合一」地方選舉，當地一些朋友形容選舉結果為「國民黨大勝」或「民進黨慘敗」。但我個人認為，贏家應該是台灣民眾。

2014年的「九合一」選舉，在「太陽花運動」背景下使得當時在野的民進黨拿下13個縣市長席位，相比之下國民黨原有的15個席位只剩下6席；而2018年的「九合一」選舉，在「韓流」帶動下國民黨再次從民進黨手中拿走15個縣市長席位。這一次，台灣民眾用選票再度對令民眾不滿的民進黨當局施以懲誡。用一句老百姓的語言來說就是：「幹得好留下，幹不好滾蛋。」

有些台灣時事評論員和學者認為，這次國民黨大勝必將在2024年贏得「大選」，但我個人感覺作出這樣的判斷還為時過早。

的措施包括：首先，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全國的立法機關，可以為大灣區立法，例如通過《綱領法》、《框架法》或《大灣區合作建設規劃法》，或者以決定的形式授權大灣區城市頒布地方性法律落實2019年《綱要》；其次，三地立法機關積極推動本地立法，如果仍停留在政策、口號層面，恐難以卓有成效地推進大灣區建設；第三，大灣區成立立法協調機構，制定地方立法日程，協調同步立法步驟，避免立法的地方保護主義和「畫地為牢」。

第三，完備的法律固然是大灣區建設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但是大灣區建設不能僅僅停留在立法層面，不能認為只要有了法律，大灣區建設就可以如火如荼地開展，水到渠成。為此，建立大灣區建設執行協調機構確有必要。在中央層面，2018年國務院成立高層統籌決策和實施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國務院設立的議事協調機構，負責領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由國務院發改委和港澳辦、廣東省委、港澳特區政府以及港澳中聯辦等機構的負責人組成。其象徵意義十足。

我們期待設立一個具有跨區域權威的行政領導機構，這就需要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介入。香港特區新一屆政府也注意到了這一需要，提出了成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並由行政長官和三位司長出任組長和副組長。我們期待這一督導組能夠採取具體的措施來加強與內地的協調與合作，將法律、政策和具體措施落實、「在地化」；已間樓梯響，期待人下來。

#### 四、香港的經驗與貢獻

除大灣區「9+2」合作外，粵港澳三個法域需要發掘各自本土法治優勢，加強本地法治建設，而本地法治建設在討論大灣

區建設時常常被忽略。首先，大灣區擁有「一國、兩法制、三法域」的獨特法律環境，三地具有不同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模式，這些差異性導致三地法治建設的路徑、方法和經驗各有千秋。其次，大灣區法治整體水平取決於三地各自的法治化建設，包括法治文化水準的提升，任何一方或一個城市的法治化水平都可能影響到大灣區的法治整體水準。最後一個原因，也是一個重要的現實原因，現階段三地司法和法律體系仍保持高度的獨立性，地域特徵明顯，雖然合作正在加強、增多，但是仍然受制於眾多法律壁壘和法律衝突，甚至各自為政。要打破法律壁壘但又不破壞各自法制基礎與特徵，這值得專業人士認真思考。

從香港出發，「法治灣區」建設的香港本土經驗和優勢包括：（1）保障司法獨立，尊重法院的獨立審判權；（2）高度國際化的法律職業群體，包括來自香港、內地、眾多普通法系國家的律師、仲裁員、調解員在香港提供法律服務；（3）作為中國唯一的普通法法律體系，要為大灣區企業走出去（乃至服務於「雙循環」），與眾多普通法系國家和地區「打交道」提供法律服務支持；（4）香港是一個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去年更獲評為全球最受歡迎仲裁地的第三位，潛力尚待挖掘；（5）作為國際港口，同時繼承了普通法悠久的海事海商法律，香港高等法院特別設有海事法庭，為香港打造海事海商糾紛解決中心奠定堅實基礎。

（文章基於作者在首屆深大灣區論壇暨粵港澳大灣區高端法治論壇「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化營商環境」研討會上的發言稿修改而成。感謝肖石靈博士提供的協助。）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一些人員稱行政長官建議今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是所謂的「肆意釋法」，甚至抹黑有關決定會「破壞」香港普通法制度，云云。事實上，即使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外籍律師，當事人的權利保障並沒有任何影響。而且當局可以此契機，調整目前司法界現狀，保障本地法律界人士就業，香港律師優先。特區政府在處理本案時，一直胸懷國安大局，堅守法治精神和專業要求，全力維護國安法的權威和尊嚴。

從是次終院判決可見，確保香港國安法得到完整準確、不折不扣的貫徹實施任重道遠，暴露的問題須一一解決，要做的工作還很多。香港司法機構有必要進行司法改革，進一步加強對香港國安法的正確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因應情況，對其條文適時作出權威解釋，正是完善特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的應有之義。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執委

自佩洛西竄台後，多名美國政客跟風竄台，甚至一些歐洲政客也去台灣「打卡」，這些舉動確實吸引了大量媒體的眼球，但並不意味著國際社會對台灣的認知發生了多大改變。事實上，通過俄烏衝突台灣民眾已經心知肚明，如果兩岸發生衝突，美國大兵肯定不會越洋而來相助，美國最多只會在國際社會上發聲及提供所謂的軍援。但毫無疑問，美西方政客接連竄台在客觀上加劇了兩岸局勢的緊張化和危機感，不僅引發大陸民眾群情激憤，也促使大陸的主流民意從過去一直信奉的「中國人不要打中國人」，逐漸轉化為「我們若再有所作為將失去寶島」。對此，台灣選民都看在眼中且了然於胸，台灣民眾敏感的神經受到相當大的觸動，所以才用手中的選票來作出有力的回應。

## 對台灣選舉結果的思考

首先從歷史上看，2012年的「大選」，國民黨馬英九擊敗民進黨蔡英文，但國民黨在2014年的「九合一」選舉中大敗。2016年國民黨在「大選」籌備初期犯了嚴重錯誤，最終導致敗北，其重要原因與蔡英文此次在桃園所犯的錯誤類似，即臨陣換將對選民不夠尊重。之後2018年的「九合一」選舉中民進黨大敗，但民進黨當局其後利用香港的黑色暴亂，使他們在執政滿意度很低的情況下扭轉乾坤，將蔡英文再次送上位。

其次我認為，千萬不能將「馬」和「驢」當成是同一回事兒。必須客觀對待未來的選舉，既然目前連參選人是誰都不知，又怎麼可能曉得最終的贏家？我個人認為，這次的選舉結果還算是在預計範圍之內，但後面的路還長着呢！尤其是對政治而言，兩年的時間相當漫長。

另據島內公布的統計數字，截至11月26日晚11時，有關「公投」議題的投票結果表明，在約1924萬投票人中，同意者有565萬，雖然佔有效票數的52.96%，但僅佔總票數的29.35%。實際上，此次「公投」對於遏制「台獨」具有關鍵意義，由於這次結果造成的高門檻，未來台灣任何涉及「法理台獨」的「公投」，要想通過其難度都會相當之大。

區建設時常常被忽略。首先，大灣區擁有「一國、兩法制、三法域」的獨特法律環境，三地具有不同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模式，這些差異性導致三地法治建設的路徑、方法和經驗各有千秋。其次，大灣區法治整體水平取決於三地各自的法治化建設，包括法治文化水準的提升，任何一方或一個城市的法治化水平都可能影響到大灣區的法治整體水準。最後一個原因，也是一個重要的現實原因，現階段三地司法和法律體系仍保持高度的獨立性，地域特徵明顯，雖然合作正在加強、增多，但是仍然受制於眾多法律壁壘和法律衝突，甚至各自為政。要打破法律壁壘但又不破壞各自法制基礎與特徵，這值得專業人士認真思考。

從香港出發，「法治灣區」建設的香港本土經驗和優勢包括：（1）保障司法獨立，尊重法院的獨立審判權；（2）高度國際化的法律職業群體，包括來自香港、內地、眾多普通法系國家的律師、仲裁員、調解員在香港提供法律服務；（3）作為中國唯一的普通法法律體系，要為大灣區企業走出去（乃至服務於「雙循環」），與眾多普通法系國家和地區「打交道」提供法律服務支持；（4）香港是一個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去年更獲評為全球最受歡迎仲裁地的第三位，潛力尚待挖掘；（5）作為國際港口，同時繼承了普通法悠久的海事海商法律，香港高等法院特別設有海事法庭，為香港打造海事海商糾紛解決中心奠定堅實基礎。

（文章基於作者在首屆深大灣區論壇暨粵港澳大灣區高端法治論壇「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化營商環境」研討會上的發言稿修改而成。感謝肖石靈博士提供的協助。）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一些人員稱行政長官建議今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是所謂的「肆意釋法」，甚至抹黑有關決定會「破壞」香港普通法制度，云云。事實上，即使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外籍律師，當事人的權利保障並沒有任何影響。而且當局可以此契機，調整目前司法界現狀，保障本地法律界人士就業，香港律師優先。特區政府在處理本案時，一直胸懷國安大局，堅守法治精神和專業要求，全力維護國安法的權威和尊嚴。

從是次終院判決可見，確保香港國安法得到完整準確、不折不扣的貫徹實施任重道遠，暴露的問題須一一解決，要做的工作還很多。香港司法機構有必要進行司法改革，進一步加強對香港國安法的正確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因應情況，對其條文適時作出權威解釋，正是完善特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的應有之義。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執委

自佩洛西竄台後，多名美國政客跟風竄台，甚至一些歐洲政客也去台灣「打卡」，這些舉動確實吸引了大量媒體的眼球，但並不意味著國際社會對台灣的認知發生了多大改變。事實上，通過俄烏衝突台灣民眾已經心知肚明，如果兩岸發生衝突，美國大兵肯定不會越洋而來相助，美國最多只會在國際社會上發聲及提供所謂的軍援。但毫無疑問，美西方政客接連竄台在客觀上加劇了兩岸局勢的緊張化和危機感，不僅引發大陸民眾群情激憤，也促使大陸的主流民意從過去一直信奉的「中國人不要打中國人」，逐漸轉化為「我們若再有所作為將失去寶島」。對此，台灣選民都看在眼中且了然於胸，台灣民眾敏感的神經受到相當大的觸動，所以才用手中的選票來作出有力的回應。

值得慶幸的是，過去20多年來我作為一個近距離的觀察者，閱盡島內大小各種選舉，因而可以客觀認識到，台灣同胞都是明白人。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對於廣大台灣民眾，我們不僅要有愛心，更要有信心和耐心。可以相信，雖然兩岸和平統一不會輕易達成，但辦法總比困難多，前途依然是光明的。

**全國政協委員（台聯組）、中華新時代智庫基金會理事長**